

史学史学科体系的重大突破

——评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

邹兆辰

张广智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以新的视角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体系^①，并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对19世纪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评述，是当代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从西方史学史到中外史学交流史

改革开放以来，张广智一直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不断推出新版本的西方史学史教材和相关著作，主编了我国首部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在充实完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同时，他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

作为一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张广智在研究西方史学、撰写西方史学史教材和专著的同时，也在思考外国史学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他先后撰写了《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他的自选文集《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也可表明他是从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关注西方史学。该书的下篇就是“欧风美雨的东方回音”，这意味中西史学交流已经成为他研究西方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他进行的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如2004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的《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一文中“谁是中国的兰克”这一问题就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与热烈讨论，这表明探讨域外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思考。张广智在研究西方史学史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研究”意识，即不仅要关注、研究西方史学某流派、思潮、史家本身的发展，也要关注它们的辐射作用，也就是对中国在内的域外的影响。

这在开始时仅仅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渐渐地变成一个新领域的开拓。为了推进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21世纪初，张广智主持了一项课题，其成果即《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②。该书初步建立了一个阐述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体系：一方面综合性地阐述20世纪不同时期中外史学交汇的状况；另一方面又选取若干中外史学交流中的个案进行重点阐述。张广智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就是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详尽史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可以预期的是，重视史学史的影响研究，将为未来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并有望成为史

①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简称《交流史》。

② 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①他认为,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史研究只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单一格局,也不仅因为它拓宽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更在于它在史学史学科建设发展进程中的意义。^②这个项目的完成为学术界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该项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评论者称该课题“开辟了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它对于今后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所揭示的学术路径又为后来学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学术空间”。^③

二、中外史学交流史与文明交流互鉴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可以说是对这个新领域研究的探索,但该书把交流的时间限定在20世纪,对于如何建立交流史的体系也存在着诸多短板。因此,该书出版后,张广智决心对中外史学交流进行更长时段和更宽领域的探索。在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出版了具有全新体系和丰富内容的《交流史》。这项成果证明了张广智当年的预言——中外史学交流史已经成为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说当年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还是从西方史学史研究基础上的“影响研究”扩展出来的,那么,今天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已经发展成介于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

这部史学交流史开创了一个新的范畴和体系。首先,研究的时间范围从20世纪扩展到“近代以来”,不论这个“近代以来”如何确定它的上限,研究者把研究的目光提前到19世纪以来是毫无疑问的。其次,该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史开辟了新的研究体系。该书上编“域外史学在中国”,主要阐述近代以来域外史学(主要为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及产生的影响;下编“中国史学在域外”,主要叙述中国史学输出域外及对该国和地区史学产生的影响。该书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传播情况,有些章节的内容不仅限于近代,如中国史学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古已有之。该书建立的体系非常明确地构建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新框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广泛性,它可以包容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各种潮流、各个有代表性的史家和史著的相互影响。

21世纪初,有学者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合理的。”^④虽然我们对于史学史的总体结构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很明显史学交流史与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可以看成是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而史学交流史在21世纪初还是“有待铸造”的一足。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张广智带领的团队已经把这一足“铸造”起来了。这部书的出版郑重地向读者宣布“史学交流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确实,中外史学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史学本身,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

① 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② 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第9页。

③ 张井梅《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读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8年卷。

④ 朱维铮《史学史三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内容提要”。

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动人心的文明华章。”^①中外史学就是记载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图谱和乐章,中外史学的交流无疑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一项重要内容,史学的交流同时也是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交流。我们从中外史学交流中可以窥视到中外文明交流的部分情景,因此,中外史学交流的意义超出了史学本身。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广智在向广大读者介绍西方史学的时候,就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史学的发展。他主编的这部《交流史》,更体现了他以文化视角看待史学发展的理念,这部著作让我们可以从中外史学交流的事实中,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意义。换句话说,《交流史》一书为我们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和重大意义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窗口。

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是对双方的文化情况、特点与优长有所了解,更应该互相学习与借鉴。《交流史》在总结美国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趋活跃,尤其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的不断推进,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仍将继续,甚至可能形成‘热潮’。对此,我们需要加强同美国史家的交流与对话……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为我们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及新的研究思路。”^②

三、多维度构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体系

《交流史》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新鲜感,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特点。

第一,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

平等看待不同的文化,是探讨文化交流的前提。张广智认为“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③中国史学与以西方史学为主的外国史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主体,它们都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发展中具有各自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中外史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文化,是各自文明的体现。

对待不同的文明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习近平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④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也必须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中国史学有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一样从来没有中断过,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这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故步自封、盲目骄傲,蔑视西方史学。同样,西方史学自近代以来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的专业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各种史学思潮、流派、方法竞相而出,有所所长,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思想和方法,盲目崇拜西方史学。正如张广智所说“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不少,对域外史学或顶礼膜拜、全盘接受,或一概排斥、夜郎自大,这两种极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①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2—63页。

②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第1213页。

③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导论”第7页。

④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401页。

学前进的步伐。”^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处于隔绝状态,既不能正确看待西方史学,了解它有哪些优长;也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史学遗产,缺乏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有了进行平等交流的条件,学者们也认识到,为了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域外史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交流史》一书正是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态度看待两种史学,书写一部真正的史学交流史。

在以平等态度看待西方史学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以同样态度看待中国史学的西方史家在研究和介绍中国史学方面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例如,在“中国史学之西渐:美国篇”一章中,作者介绍了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状况、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的变迁,特别是“二十四史”在美国的译介和影响。同时,作者也谈到美国学者看待中国史学的平等态度,指出他们“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对传统史学的兴趣趋于浓厚,开始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史学,注重中西史学之间的比较,致力于从中国史学内部寻找有价值的、可与西方史学互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这成了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②

第二 积极补足短板,力争写成一部全方位的史学交流史。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外史学交流的问题,张广智最早涉足。长期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主要是对西方史学或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影响的研究,涉及中国史学对域外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以张广智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为例,全书18章,涉及20世纪初域外史学的东传、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引入、20—40年代的输入、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的输入、当代学者对西方史学的重评与引进、美国新史学派在中国、兰克史学和他的中国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回响、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苏联《世界通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反响等内容。但是,讲到现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则只有两章的篇幅,这种“交流”显然是不对等的,实质上还是外国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的研究。

《交流史》一书的出版基本打破了这种不对称的格局,作者力求补足过去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短板,在中国史学对国外的影响上下功夫,形成了全书的下编“中国史学在域外”。虽然还没有形成完全对称的格局,但这一编的内容比较充实,包括中国史学之东渐朝鲜篇、中国史学之东渐日本篇、中国史学之西渐俄罗斯篇、中国史学之西渐美国篇等。每一篇都延请在该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撰写,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史实全面、评述中肯,充分显示了中国史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以“中国史学之西渐:西欧篇”一章为例。该章充分显示了中国史学在西欧的影响,在时间上贯穿了从16世纪传教士汉学至当代的几个世纪,在地域上包含了以法国为主的西欧诸多国家,在内容上体现了包括史学典籍在内的中国文化在该地区的影响。比如,该章讲述了为中国唱赞歌的耶稣会士、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黑格尔的中国想象、《论语》《易经》《史记》的翻译情况,特别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成就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史记》翻译。作者指出“且不论中国古代典籍对欧洲文明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我们都应看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富饶的文化遗产在欧洲历史上的确引发了诸多思考,‘东学西渐’所带来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扩言之,对西方各界持续升温的‘中国热’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深刻地启示了我们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整个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激励,不断取得进步,不断走向灿烂的。历

①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导论”第4页。

②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第1135页。

史如此,现代社会更是如此。”^①

这些对中国史学在域外影响的研究不限于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也包括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域外的影响,比如“西欧篇”一章就以很大篇幅讲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知与理解”,讲述了英国的《中国季刊》和法国的谢诺、索布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关注。在“美国篇”一章中,作者以一个专题论述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仅论述了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也分析了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态度的变化,指出一些学者的认识和评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而是开始尽可能跳出意识形态话语,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并将评论控制在学术层面上。

《交流史》一书在中国史学的域外影响上花费了很大力气,而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过去很少见到的。这些内容构成了该书突出的亮点,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史学交流史。

第三,拓宽观察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扩展史学交流的内容。

既然以一种文化的视野看待中外史学交流,就应该扩展交流的内容,而不能把交流局限在专业的史学领域,把史学交流仅看成是史学家之间的交流。以前的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在时间上往往注重现当代,在内容上注重历史学者间的学术性交流。这固然是中外史学交流的核心,应该予以重视,但也会造成一定的局限。《交流史》一书的重要特点就是大大扩展了交流的时间范围和交流内容。在这部《交流史》中,无论是讲域外史学对中国的影响还是讲中国史学对域外的影响,阐述的内容都不限于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作者们将传教士们以及侨居中国的外籍侨民做的工作也包括在内,这样就这部交流史的时限提前到20世纪之前。

《交流史》把中外史学交流的时间上限提早到19世纪是有学理根据的。作者依据邹振环所著《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一书的观点来确定交流的起点。^②该书认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时间必须以19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的译述活动为起点,把1815年至1900年这一段时间归属为晚清,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就将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的译述活动视为“西史东渐”的起点。我们从《交流史》的许多章中都能看到这些传教士们出版报刊、翻译书籍,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其中就包括史学。让中国读者最早知道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的不是史学家而是传教士。同样,这些传教士把中国历史和文化介绍到西方,有的甚至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传教士是中外史学交流的先行者,肯定他们在中外史学交流上所做的贡献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有益于文明交流互鉴。除传教士外,外国的汉学家们也在中外史学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交流史》也介绍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

《交流史》在阐述域外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时,特设专章论述西方史学与中国台湾的史学交流,体现了作者们论述中外史学交流的广阔视角,这也是过去的交流史所忽视的。台湾地区的学者在了解西方史学方面比大陆要早,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外史学交流中起了某种中介作用。作者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台湾地区学者张贵永对欧美史学的研究成就,指出张贵永从欧洲社会状况出发,重视欧洲近代以来史学中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考察其起源、成长与影响,分析不同时期学者思想的贡献与不足。这种结合社会背景、关注学术传承、重视史学思想的做法,是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实践的突

^①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第1063页。

^② 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出特征,在某些方面,与大陆不同时期的同行所见略同,是研究西方史学的成功范例。^①

第四,以历史的眼光、全方位的视角看待并阐述史学交流,使之真正成为一部交流史。

阐述中外史学交流的某些事实并不难,但要写成一部交流史却并非易事,这就要求作者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全方位的视角看待史学交流。不同历史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的内容不同,同一个学派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所以,对于史学的交流也必须进行历史的阐述。《交流史》第七章“近代德国史学在中国:清季民国以来的兰克史学”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作者首先考察了兰克史学东传的途径,包括借路日本、转道美国、径自欧洲等,在谈到兰克史学对中国的影响时主要从关于西史教材的编写、中西史法的对比、借鉴研究与移译抄袭,以及留洋学子直接传播等途径来说明。而兰克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五四前后的绍述与忽视,到史语所成立之前的接触与犹疑、史语所成立之后的接纳与反馈,到从傅斯年、陈寅恪看兰克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而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兰克史学在中国的反响也是一部历史,从开始的批判兰克到“文革”后的回归兰克,到跨世纪研究的重读兰克。可以看出,兰克史学在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的命运是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一个缩影。

第五,注重阐述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人的作用。

中外史学的交流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报刊、书籍、学校教育、学术报告讲座、研讨会等途径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个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中国学者通过对域外史学的了解和研究向中国学人介绍外国史学的动向,有的外国学者则向当地人介绍中国史学的发展成就,还有更多的学人对外国史学输入中国进行学术上的呼应。中外史学的交流就是仰仗这些学者的积极活动进行的。所以,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中应该有他们的地位。《交流史》记述了许多在中外史学交流中做出贡献的人物,例如,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在介绍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肯定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在引进西方史学方面的贡献;在讲到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时,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朱谦之和胡秋原;在讲述新时期的史学交流时,专门用一节的篇幅讲述张芝联对中外史学交流的贡献;讲到在美华裔学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其影响时重点讲了洪业、杨联陞等老一辈学者,也介绍了汪荣祖、王晴佳等当代学者的贡献。此外,一些参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当代青年学者,也在本书中有所反映。

四、中外史学交流史有待完善的空间

《交流史》是张广智和他的团队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它的问世在史学史学科建设上开辟了新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一部著作不可能包含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所有内容,由于内容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不同,各章的撰写也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在中外交流的地域上也还有待扩展的空间,如在和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交流上还是空白。为了更好地完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建设,笔者希望有些内容应增加到交流史中。

第一,比较史学也许算不上西方史学一个有完整学术理念的学派,在很大意义上是普遍运用的方法。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史学的影响很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

^①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第716页。

论教材都把它列为史学新方法,《交流史》在介绍年鉴学派时也涉及比较方法。受这种新方法的影响,有学者写过比较史学的专著,不少学者也运用这种方法撰写专著或论文,比如,中西封建社会的比较、汉代奴隶制与罗马奴隶制的比较、英国都铎王朝与中国明王朝的比较,等等,比较方法的运用大大促进了当时的史学研究。随着更多西方史学理念的输入,比较史学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但它产生过的影响还是值得总结的。

第二,苏联史学曾经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史学,无论在历史观、学术体系、编撰方法等方面都曾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广智撰写过多篇关于苏联史学的文章,在《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曾亲自撰写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的输入和苏联《世界通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但在《交流史》中,没有设专章论述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只在第15章“唯物史观的输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有一节讲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的大规模输入,这样的地位、篇幅与阐述其他西方史学流派对中国的影响不相称,更与第18章“中国史学的西渐:俄罗斯篇”大篇幅论述中国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在《交流史》中没有反映,是一个空白。张广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做过专门研究,这部中外史学交流史缺少这方面内容也是一个缺陷。

上面所说的第二、三两项内容虽然在《交流史》中没有呈现出来,但在张广智对西方史学史的整体研究成果中是有充分显示的,也许是为了避免和已有的学术成果重复有意地避开了这些内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中外史学史交流的情况,还需要关注张广智此前的其他成果,如《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

第四,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一些新领域输入中国,受到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催生了史学的一些新领域,如生态史、全球史、社会史、文化史、性别史等。这些史学新领域的产生突破了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的框架,有的新领域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希望中外史学交流史能与时俱进,不断地反映史学交流的新情况。

总之,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体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科的建立为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视角,扩展了新的内容。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也有助于培养学贯中西的史学人才。如果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科的建设能够更多地着眼当下、详今略古,更关注正在发生的史学交流情况,不仅有益于史学史学科建设,也会对促进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与繁荣有积极意义。正如张广智在《交流史》结尾中谈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外史学交流的意义时所说“我们开展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关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更与我们的文化自信相关联。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时代氛围弥足珍贵,历史机遇稍纵即逝,让我们牢牢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努力奋斗,在中外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的过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①

(作者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00089)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第1247页。